

# 陈辽文存

第十二卷

香港银河出版社

# 陈 辽 文 存

第 十二 卷

(陈辽自传)

香 港 银 河 出 版 社

书名：陈辽文存（第12卷）  
著者：陈辽  
封面设计：陈薇  
出版：香港银河出版社  
地址：香港九龙大埔道160号A地下  
印刷：南京陵东印刷厂  
地址：南京市孝陵卫朱庄  
规格：850×1168mm 印张：19.25  
2014年8月第一次印刷  
国际统一书号：ISBN962-475-248-6  
定价：港币200元  
人民币200元



陈辽父亲陈纪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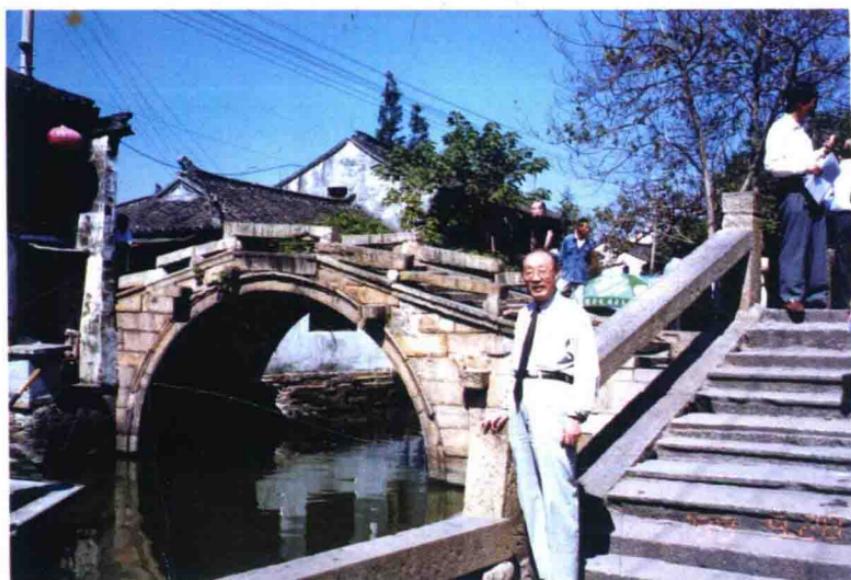
陈辽母亲顾杏元



1954年冬摄于六十军



1979年11月在雨花编辑部和叶至诚同志研究稿件



1999年9月于昆山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http://www.ertongbook.com)

# 序

我只是历史长河中的一滴水。像我这样的一个普通学者，有必要发表自传吗？从七十岁以后，考虑这个问题，至今已有十二年。时至今日，我终于有了答案，有必要发表。因为，我虽然只是历史长河中的一滴水，但我这八十二岁在一定程度上折射了百年中国的历史变迁。

第一，从我幼时接触、亲近的父辈生活算起，自清末至今已有一百多年。我耳闻、目睹、亲历了中国这一百多年间的大变。

第二，我是一个对农民、对解放军、对工人都比较熟悉的人。我从小在农村长大，寒、暑假时干过农活；参加革命后，部队驻地多在农村，常和农民交往；新中国成立后，在农村劳动锻炼过；在农村搞过“四清”；文革期间，“解放”后被派遣在农村搞“一打三反”；后来下放到农村中学，一待就是五年；我对农民、农村有深厚感情。我于1945年参军，在解放军13年（1945—1958），对军队生活有过切身体验。1958年转业到地方，长期住在我妻子所在单位的工厂宿舍，左邻右舍全是工人。我和他们交上了朋友，亲密无间无话不谈。在知识分子中，像我这样对农民、对解放军指战员、对工人都比较熟悉的人，有，但不很多。

第三,我是个读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列宁全集》、《斯大林全集》、《毛泽东选集》、且对《资本论》(1—3卷)读过两遍的人,又是读完从《史记》到《清史稿》二十五史以及《资治通鉴》的人。因此,对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中国历史,我并不陌生,略有心得。所以,我的评论、研究领域并不局限于文艺,还涉及到历史、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不同方面。

第四,1957年3月1日,我因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批评教条主义的文章《对陈其通等同志<意见>的意见》,受到过毛泽东的提名表扬;1957年4月10日《人民日报》社论《继续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中又肯定了我对陈其通等人的批评,曾一度“走红”;但在反“右派”斗争中,香花变毒草,又因同一篇文章差点被划成“右派”,最后以“中右”论处,受留党察看处分,转业到地方。1961—1962,党中央贯彻“文艺十条”、“文艺八条”,重提“双百”方针,我又因批评了“金棍子”姚文元;为《娄山关》一词与郭(沫若)老商榷,历史事实又证明了是我的观点正确的;但在“文化大革命”中却被批成“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在“五七”干校劳动后下放到一所农村中学工作达五年之久。二十年间(1957—1976)两起两落,我的个人际遇,有一定代表性。

第五,新时期到来后,因为我和董健(后为南京大学副校长)、包忠文(后为南京大学中文系副主任、教授)、甘竞存(南京师范大学教授)四人思想解放,批“左”积极,被时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的许家屯,定为江苏的“四条汉子”,不准江苏报刊、电台、电视台发表我们四人的文章,不准报导我们四人的活动情况,不准学术界邀请我们四人参与学术集会。江苏“四条汉子”我是第一名。在“清除精神污染”时,又因我在1983年初发表过《马克思恩格斯的异化观

和文艺创作》一文(载《江海学刊》1983年第2期,讲林彪“四人帮”搞异化)而被勒令检讨,但我始终未承认“错误”,直到胡耀邦同志讲了“精神污染,说不清,不要再搞‘清污’了”后才解脱。

第六,在评论、研究工作中,我是一个有点儿“闯”劲的人。在现当代文学研究方面,我是新时期第一个为活着的作家叶圣陶写评传的人(《刘志丹》事件后,极左路线不允许为活着的人树碑立传)。我是中国第一部《台港澳与海外华文文学辞典》的主编。在文艺理论研究方面,我是中国第一部也是世界第一部《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史稿》的作者。是我第一个创造“文艺信息”这一复合词,并写出了《文艺信息学》这部开辟了一门新学科的专著。在古典文学研究方面,是我首先提出,《三国演义》在前、《水浒》在后(从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开始,学术界都以为《水浒》在前、《三国》在后);是我发现《封神演义》中的阐教和截教之斗,实为道教中的符录派与丹鼎派之争;是我提出,《红楼梦》是曹雪芹的特殊忏悔录。在历史研究方面,是我发现,东北抗日联军的失败(从全盛时期的4.5万人到1942年8月时,只剩下一千人)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军队的最大悲剧。在经济学方面,是我在报纸上最早提出:要以预测代替计划;是我在21世纪批评了经济学界流行的“生产要素价值论”……。等等。

第七,我在晚年对国事有许多思考。

有此七条,我认为,尽管我是历史长河中的一滴水,一个普通的做学问的人,还是值得写自传,发表自传。通过我“这一个”可以在某一个方面折射一百多年中国的变迁,特别是折射一百多年中国文艺的变迁。

当然,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我更是一个有缺失,有过错的人。

且不谈我性格上的偏缺，即以过错而言，参加革命后，1951年的“三反”、“五反”运动中，作为记者，我只报道了这一政治经济运动的正面，而未能看出自然也没有报道这一运动定下“老虎”指标、打击面过宽过大等负面。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我接受了“揪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口号，卷入了当时的乱军活动。1976年“天安门事件”后，我僻居农村中学，仅凭报纸上的一些报道，写了批判《鬼叫歌》（“欲哭闻鬼叫，我哭豺狼笑……”）的错误文章。总之，在“文化大革命”这场对每一个人都是考试的政治大运动中，我交出的考卷是不及格的。对此，我深感愧疚。（在2000年出版的《陈辽文存》第4卷《后记》里，我就公开作过自我批评，“引为终身的教训”。）新时期到来后，我的觉悟和转变也不是很快，直到1979年，我才摆脱“文革”的阴影，加入思想解放、实事求是的人们的行列。所好的，自1979年以后，我还能与时俱进，不再有过大的政治上的失误。

既然如此，只要我本着忠于历史真实的态度，既写我生活道路上说得对做得对的事，又写我生活道路上说错了做错了的事，还写我对一些重大问题的思考，表现出“这一个”陈辽的大半生，那么，别人或后代人读了我的自传，也许能从正反两方面得到某些教益；同时也为今后百年中国史、百年中国文艺史的研究者提供若干资讯。因此，发表我这个普通的做学问的人的自传，还是有一定意义和价值的。

自传中有些事、有些言谈，涉及写别人的，如有不符合历史事实之处，敬请读者们给以批评、指正。

我已八十二岁。孔子说过：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孔子只活了七十二

岁,他对一个人八十以后怎样,没有说。这里我补上一句:八十而悟。即是人到八十以后,才可能有对人生的感悟和真正的觉悟。我的自传,是否达到了对人生的真正感悟和真正的觉悟,则有待历史实践的检验。

陈 辽

2013年12月1日于南京

# 目 录

序 ..... (1)

## 第一章 家世、童年、少年

(1931.9—1945.7)

故乡和远祖 .....	(1)
一场流产的“械斗” .....	(3)
“生儿好似我，要钱有何用？” .....	(4)
“只要你不抽鸦片烟，家里的一切事由我承担！” .....	(6)
父亲十八岁即被称为“陈先生” .....	(8)
“孝子”还债 .....	(9)
陈家婚姻的悲剧 .....	(11)
父母的姻缘(一) .....	(13)
父母的姻缘(二) .....	(14)
父母的姻缘(三) .....	(16)
父母的姻缘(四) .....	(18)
共产党员打进了循循小学 .....	(19)

朱先生和我二叔	(21)
父亲参加了“第三党”	(23)
开办“陈家学堂”(一)	(24)
开办“陈家学堂”(二)	(26)
开办“陈家学堂”(三)	(28)
灵甸镇的畸形“繁荣”和顾家的没落	(29)
“吃大户”	(31)
随父亲去六堰小学读书	(33)
“龙虎斗”	(34)
金龙四大王“出会”	(36)
鸾书	(38)
游击队轮流坐庄	(39)
到“北荡”去	(41)
上良心小学	(43)
第一次参加运动会	(44)
妹妹心欲因无钱买药病死	(46)
北荡并非“世外桃源”	(47)
秦先生参加新四军	(49)
新四军到来后的大变化	(51)
跳级进了大豫中学	(52)
秦退之校长免去我学、杂费	(54)
进重三中学做寄宿生	(55)
师恩难忘	(57)
在海边读书	(59)
姨父被捕，升学无门	(60)

烈士殉国,受教育殊深	(62)
天无绝人之路	(64)
锡类中学的教师集体	(65)
难忘的锡类同学	(67)
闹起了风潮	(69)

## 第二章 进入革命队伍

(1945.8—1949.10)

走向革命	(71)
日本鬼子投降	(73)
树立新人生观	(74)
我所看到的最初的“左”的迹象	(76)
公开发表第一篇文艺作品	(78)
到华中去,上了建设大学	(79)
飞机轰炸把建设大学赶到徐杨庄	(81)
北撤山东	(83)
从大学生到护理员	(84)
伤员需要知识分子	(86)
过黄河	(88)
做起了食堂会计	(89)
进文工队	(91)
初恋	(93)
在歌剧《两种作风》中演指导员	(94)

出版《飞行快报》	(96)
南下	(98)
进入刚解放的徐州	(99)
入党	(101)
喝了长江水又北上	(103)
父母亲终于等来了胜利	(104)
支援解放长山岛	(106)

### 第三章 从文艺创作转向文艺评论：福兮祸所倚

(1949.10—1958.12)

做青年团工作，当团委书记	(109)
年轻的记者	(111)
咱们工人有力量	(112)
发表第一篇文学评论文章	(114)
由济南调南京	(115)
换了人间	(117)
报道整党试点	(119)
投身于“三反”、“五反”运动	(120)
《战勤报社》的整党	(122)
向文化进军，参加文教办公室工作	(124)
一篇批评稿，获咎去速中	(125)
搞通俗文艺创作	(127)
参加“反胡风”斗争	(129)

研究古典文学的开端	(131)
“肃反”到了我头上	(132)
我在“肃反”后的反思	(134)
父亲之死	(136)
被授予大尉军衔	(137)
毛泽东问询到了我	(139)
“走红”三个月	(140)
风云突变,我成了“反右派”的对象	(144)
“夹起尾巴做人”	(146)
体验了“大跃进”	(147)

## 第四章 “大跃进”——文艺调整——

### “以阶级斗争为纲”中的我

(1958—1966)

“赛诗会”	(151)
恢复写文学评论	(153)
开始“反修”,参加江苏第三次文代会	(154)
得轻度浮腫,与和尚一起劳动	(156)
当起了《雨花》的理论编辑	(158)
批评姚文元	(159)
对中共江苏省委几个领导人的印象	(161)
几位宣传部长	(163)
“才过了几天好日子,又提什么以阶级斗争为纲”	(164)

“《江心》《江心》，掉到江心！”	(166)
参加“四清”试点	(168)
准备京剧革命现代戏会演	(169)
巡视江苏京剧现代戏剧目	(171)
“划阶级”	(173)
参加第二批“四清”	(174)

## 第五章 “文革”十年：我不及格

(1966. 6—1976. 10)

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	(177)
戴昭造反是一个信号	(179)
在“揪军内一小撮”中我犯了错误	(180)
“清理阶级队伍”清到了我	(182)
真正住进“牛棚”，和牛一起住了三个月	(184)
恢复党组织生活，重新登记为党员	(185)
在石马蚕种场养蚕	(187)
搞“一打三反”	(189)
深挖“5·16”的运动	(190)
下放到农村中学	(192)
在学校工作怎能不抓教学？	(194)
为女儿上工农兵大学奋斗	(195)
与“工宣队”较劲	(197)

不听通知,为周总理逝世开追悼会	(199)
天安门事件后写了“批邓”小文章	(200)

## 第六章 从拨乱反正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1977—1988)

“归队”	(205)
重回《雨花》编辑部	(207)
为“探求者”平反作舆论准备	(208)
参加中国作协召开的理论工作会议	(210)
对毛泽东提倡的“两结合”创作方法质疑	(212)
作为江苏代表团的秘书列席参加第四次文代会	(213)
决定我后半生前途的一次选择	(215)
要不要“写真实”?	(217)
写《叶圣陶评传》	(218)
日记何罪,二十五年后重新记日记	(220)
关于《爱,是不能忘记的》	(222)
在反封建问题上,中国走了一条“之”字形的曲折道路	(223)
包头之行	(225)
山西之行	(227)
石家庄之行	(228)
郑州之行	(230)
武汉之行	(231)
庐山之行	(233)